

山西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目 录

临汾四先烈与义和团	侯少白	(1)
山西交文惨案始末述	尚 德	(8)
辛亥革命时期新军以外的各种力量	南桂馨	(11)
陆镇琦父子被击毙和陆光熙的政治面貌	王定南	(15)
姚以价是否同盟会员及其它	大同市政协	(19)
李岐山被害的一些情节	定 南	(21)
余燊给黄国梁的咨文		(24)
黄国梁自述(遗稿)		(26)
抗战以前的山西财政	仇曾治	遗稿 (29)
阎锡山滥发晋钞情况	张邦彦	(36)
绥西屯垦见闻	李志舆	(38)
河东革命记	赵攀襄	藏稿 (45)
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	张茂先 译	(97)

临汾四先烈与义和团

侯少白

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山西赵城县义士曹顺曾举起反清复明大旗，率领该县人民占领县城，杀死知县杨延亮，并派人袭取洪洞。时值临汾县城内正在举行府考，平阳府属十一州县童生均齐集临汾应考，试题揭示后，闻赵城起义，头人已到洪洞，各童生破门而出，有健者百数十人，赴洪洞参加，到则曹顺已败，头人均散走。此事虽似昙花一现，未能如曹顺所愿，但已在平阳府属人民心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就使推翻清代王朝，成为人民内心深处的潜在意识。

道光二十年（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清廷与英国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一方面暴露了清廷无能，一方面激发了人民种族革命思想，特别是在临汾四先烈意识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临汾四先烈即：董华、王得礼、陈某（佚其名）、董福田等四人。董福田、陈某年岁稍长，余二人皆系中年。董华、王得礼早年曾在驻临汾的太原镇绿营作过千总、把总等官，对清廷对于满汉两族显分畛域颇感不平，而主管官太原镇参将春某，又系满洲人，颠顿用事，赏罚不明，因此他二人即先后退职。董华退职后，在临汾城内关帝庙前大街开设月盛居饭馆，乘机交结四方游侠；王得礼因窘于资，乃以赶轿车糊口，日在关帝庙前大街车市招揽乘客。因他过去与董华曾在绿营共事，故两人过从甚密。至陈某则精于医理，早年也因有反清嫌疑入狱。获释后，即在关帝庙前大街月盛居饭馆对门开设药铺，并为人治病。他与董华、王得礼二

人相识后，交情渐深，犹如手足。此三人均不满意清朝统治，虽有异志，苦无时机。时有董福田，以教书为业，为人正直仗义，有古游侠风。他不仅有读书破万卷、下笔扫千军的气概，而且富有民族观念和浓厚的爱国思想。他对学生讲学时，除了讲授四书五经外，特别喜爱讲述历代民族英雄故事。宋代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史可法等英雄事迹，都是他对学生们经常谈论的资料。他在讲述岳飞所作《满江红》词中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一句时，更把岳飞当年胸怀壮志，想驱逐金人，直捣黄龙，不要辜负大好年华的心情，绘形绘色地尽量描述。在当时异族君主专制淫威之下，能有这样富有民族观念、爱国思想的私塾老师，确实也是不曾多见的。董福田不仅认真教学，为他的学生所信仰，而且对于地方公益事务，凡力所能及者亦莫不尽力相助，或撰文以为号召，或出资以助其成，故在临汾绅士中享有极高之声誉。但因他素怀反清之志，所以在交游之中亦特别注意有民族意识之人。恰好董华、王得礼、陈某等，久闻其名，并心仪其人，亟思与他相识，而他又常往月盛居用饭，遂得识董华、王得礼、陈某。他们所业虽有不同，但言谈时事，臧否人物，则如出一辙，而对于吴三桂卖国求荣，引清入关，洪承畴畏死投降，为虎作伥，尤为深恶痛绝，是以颇相投契。

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定鼎南京，即遣林凤祥率师北伐。时有临汾人范二老，参加林军。当林军北上时，范二老因病返回临汾，得晤董福田，因对他说：林凤祥军纪律极佳，所至秋毫无犯，尤其爱护人民，可惜言语隔阂，同人民情感上不易即时水乳交融。范二老又说：林军扎营地方大门上写的是：“虎贲三千直入幽燕大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钧天。”这副对联已使董福田闻之心醉，继又听到二门上写的是：“重整大明新气象，扫除异族怪衣冠。”董听完后，不觉击节叹赏，这正反映了他反清的潜在意识。林凤祥北伐时，曾道经临汾。在他未到以前，派有前路侦

探，伪装卖磁器挑叛，先期到达临汾。其人自称由江西景德镇贩磁器北来求售，但售值甚昂，购者寥寥，贩者亦不以为意。日间游行城内与近城各乡村，并在高敞屋宇或寺庙墙上写一个很大的草字，人皆不识，当时亦无人究诘之，不数月，林军遂由河南怀庆府济源入晋，直趋临汾，攻克平阳府城，并在前磁器客人所写草字地方扎营。清廷官吏尽数为林军所杀，人民则受到优待。董福田睹此情形，颇受鼓舞，大有投笔从戎之志。惜林军在临汾驻的日期不多，即行北上，不久又在河北战败，林为清将僧格林沁所害，太平天国在北方革命势力遂绝。但董福田反清之志愿，仍隐藏在心灵深处，并未因此泯灭。

光绪庚子年，义和团起于山东，旋即蔓延于北方各省，山西省的义和团亦风起云涌，临汾也不例外。董福田遂想借义和团之势，以达其反清之愿，他就与董华、陈某、王得礼密谋说：义和团以扶清灭洋相号召，故能得清廷权贵的支持和晋抚的赞助，这与我们所怀的反清宿愿是大相迳庭的。但是义和团的基本力量，都是些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贩，这些人局限于“忠君”的思想，因而缺少民族意识，倘有人因势利导，并以满人入关后，在扬州、嘉定等城市的大屠杀，不分男女老幼俱无幸免的残酷事实，惨绝人寰的滔天恶行，以及清廷专用尸位素餐昏庸无识的满人与亲贵处理国事，不仅在条约上造成了不平等的束缚，而且在国土上引起了蚕食鲸吞的局面。我们把这些非反清不能救亡的情形告诉他们，这些朴质尚义的义和团与群众，就可能把“扶清灭洋”的大旗，改换为“反清驱洋”的大旗，这样我们四人的反清宿愿岂不就容易达到吗？这就是“拔赵帜易汉帜”的重演，你们具有意愿乎？董华、王得礼、陈某听了董福田这番话后，都非常赞同。于是董福田等四人遂共同集资二千余串，资助临汾的义和团，并与义和团首要人取得联系后，即在关帝庙租得西房三间，设立义和团临时支应处。同时，董福田等又与义和团首要人约明三事：一

不得杀戮无辜教民及其家属；二不得焚烧货物及房屋，三不得留难旅客。这些要求，义和团首要人全都接受。这样，事实上董福田等四人已然控制了临汾义和团的全部行动，而临汾县人民乍见义和团的作风与初期迥然不同，且知此乃董福田等出资供应和劝导之力，故都称颂董等功德。此后临汾义和团不仅在城中遵守秩序，而且在乡村中亦不随便行动，并严格遵从上述三项约定。从此临汾城乡得免混乱现象。

山西巡抚毓贤是主张练习义和拳最力之人，故义和团在山西发动极为迅速，教会传教士被义和团杀戮者有人，至于本省教育民被杀戮者亦复不少。当临汾义和团起事时，笔者正在汾城县就学，适因麦假返回临汾，在襄陵县的灵柏村尖站小饭铺休息的时候，看到由南来大篷车一辆，坐着西洋少妇一人，年约三十岁上下，带有小孩三个。有穿安邑县护堂勇号衣四人，荷枪围坐在旁。我就随行随问该勇，你们到何处去？他们说：我们的县官儿奉到省城毓台公文，着将运城教会洋人解送到省城保护，我们是解送洋人到省城的。他们沿路寄宿在所过各县监狱内，怕是在路上店内为义和团杀害。我听了颇不了解。我在汾城听人传说山东起了义和团，反洋人，反教民，杀贪官污吏，又听说洋人所在常向中国人用的水井内暗放药包，毒害中国人，所以山东百姓组织起义和团来保护大众，反对洋人。但是我看见大篷车坐的那个少妇带着三个小孩，愁容满面，很是悲惨的样子。我想：既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在井中放药包害中国人？由于我的好奇心驱使，因而我就特别注意义和团的行动。我到了临汾后，各村正在发动练习义和拳，青年们皆持枪弄棒提刀，游行活动。回至家中，先母见了我，很高兴地说：你再不回来我就要打发人接你，因为村中接奉东关义和团来信，正在组织练习义和拳公所。男丁十七岁以上，必须入所练习。他们向我打听你的岁数，我说今年才十五岁。他们因为你个子长得高，不信，你明日到庙上对他们说明

白，确系十五岁，并且有村中每年报的人口册可查。说完后你就回家来，明日可进城到亲戚家看你外祖母，路上有练拳的地方，最好不要进去看。第二日我进城看亲友（我村距城五里在城东北），路过东关小东门内春牛场，有义和拳正在上马练拳，约有数百人。首要人张姓（我忘其名）正在念咒后睡到地下，自称是西天古佛，下令道：现在外洋妖货在城关商铺内封存（山西抚台毓贤先有令各商铺不得买卖洋货，原有洋货封存）并未销毁，今日各村友团到齐，上街查焚外洋妖货，不得有误。张姓下令，由地下起来，查询来的村庄与人数。有人答云：来到本团的有五十余村，约三千余人，排列整齐。张巡视后又派人传知城关各铺户，迅将洋货已封存未封存的均移放街中心，候大队到时当众焚毁。各商铺不得藏匿，违者将该商铺房屋货物一概焚毁。大队向西顺序前行，至东关西头广元基京广杂货铺门口，街中心堆着由广元基移出的洋布、洋扣子、洋小儿玩具、洋灯、洋糖等物，约值银三千余两，大队到时，即举行焚毁。大队出东关西门进城东门，将城门内大街小洋货铺内的洋针、洋线、洋火各零星物件移入街心焚毁。继至县署西大街豫丰和京广洋货店门口，货物在街中排列一大片，大队到后，即时化为灰烬。豫丰和为临汾最大的京洋杂货店，洋货最多，约值万两以上。豫丰和对过两义公京广洋货铺，在街心也堆了价值略同的洋货，亦均照样焚毁。大队行至西头平阳府知府衙门，知府名崇祥，满洲人，穿着官服亲自迎接西天古佛。张某告崇知府说，把南路解省洋人着临汾县送交东关春牛场本团，我们要问明白他在山西住的地方，扔过几包毒药。问明白以后，当即交回。崇祥唯唯而退。大队仍返东关春牛场散队回村。

临汾县知县李光斗，人极狡黠，为了避与义和团谋面，常借口出外公干。知府崇祥又老朽糊涂，临汾县治下的八镇绅士，因官无主张，遇事均推诿不理，形成了无政府局面。各村义和团练

习神拳的团众，最需要的红布与黄布头巾、胸前“马”字方布、旗布（团众着黄者为黄团，红者为红团）用量不少，因团规不许索取村中分文，所用布匹或是自备，或是劝百姓自愿捐助。起初尚可备置，后来人数越加越多，自备捐助均不能继。自从董福田等所设义和团支应处成立后，才有了接济。七月初，东关团又传知各村团众，在东关春牛场集合，西天古佛张某宣称：有外县来平阳洋人，在临汾县监狱管押，未交本团，李光斗暗中受贿八百两将洋人放走，我们团众要到临汾县衙门找李光斗，叫他把洋人追回，贿款退出。这时候到达东关的有八十余村，人数约七千余众，有范姓上马下令道：今日到临汾县向李光斗要洋人。于是就整队西行到临汾县署。门者答称：县官未在衙门，他外出公干去了。询问在何处，则答称：不在镇台衙门，就在知府衙门。范又领队到知府衙门，找出崇祥说：你今天若不交出李光斗，追回洋人，退出贿款，今天就不能回衙门。崇祥无法应付此事，穿着靴帽袍褂，衣裳楚楚，随着大队步行，走至镇台衙门，去找镇台了结此事。适镇台进省未返，参将某在署代理，由该参将在镇署辕门外接见范领队与团众，并宣布说：我将写信告知镇台，请他派人迅速追回洋人，并找李光斗向团中交代，即请崇知府作保等语。崇祥答云：我可作保。团众始返东关散队。此后村中各团队，每日向各村找寻奉教居民，强迫出教。有一日至城北十里樊家河村，命柏姓家中一老妇出教。该老妇信仰甚深，坚决拒绝出教，遂为团众所杀，并杀老妇一儿，一四岁幼孙，房屋亦被焚毁。继又在城内四鼓楼洞儿，将奉教王姓房院一所焚毁。当时王姓外出，未遭伤害。团众终日在各村道路上盘查行人，遇面生可疑之人多方留难。行人裹足，农事多废，四境不安，全县民众顿成惶恐现象。这些情形，均为董福田等所熟知。自从董福田与义和团首要人约订三事后，那些杀戮、焚烧、留难等现象均不再发生。董等之言行，在义和团团众中渐树威信，而西天古佛张某及

其得力助手范某亦多遇事就商。董福田即乘间对西天古佛张某说：清廷不纲，招致外患，彼以异族入主中夏，对我汉人，歧视殊甚，何不趁此中原多事之秋，高举义旗反清，同时号召驱逐洋人，四方必然响应。张某闻之，颇为所动。正拟进一步筹划间，不料有人将此段秘密泄漏，而为李光斗所闻，李即密报晋抚毓贤，指明董福田、董华、王得礼、陈春为土匪，密谋起事，获准就地正法。庚子八月某夜，李光斗派人逮捕董福田等四人到县，未经审理，点名后即斩首府衙门前海子边，并悬头鼓楼示众。各乡村义和团众，正欲率队进城找李光斗并抢救董福田等，适有由京逃难归来乡人甚多，告以八国联军攻到北京，皇帝、太后均逃难出走，北京义和团抵抗洋人，伤亡甚大。团众遂自行解散。

（作者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山西省政协委员）

附：临汾义和团四先烈简史

董福田 死年五十余岁，是一有文化者。其人材长心细，勇敢好义。他的祖父是举人，门上挂有文魁匾额。光绪二十六年，参加义和团运动，被反动派杀害。家住东关小东门内。现在有后裔，子廷柱，过去曾充东关街长、临汾商务会文牍兼事务。孙效舒，现充太原医学院医生。

董华 死年三十岁，月胜居饭馆厨工出身，住城内塘子口。参加义和团运动，为反动派杀害后，其妻与长子（名寿子），因精神受刺激过烈，均疯死，二子小寿，投井而死。现在绝后。

王得礼 住樊家河村，是个农人。死年约三十余岁。忙时务农，闲时在城内赶轿车。临时住姚家胡同，与上述二人同时牺牲。

陈春（有的说回春） 河南人，医生，就在现时临汾城内大礼堂对门山货铺内开设回春堂药店。因参加义和团运动被反动派杀害。

（据临汾县政协委员范志淹来稿编写）

山西交文惨案始末述

尚德

一九〇九年，岁己酉，秋收告歉，麦种失时，交（城）文（水）两县农民，为了亡羊补牢，播种鸦片。当时虽有禁种之令，但清末政治不过一纸空文，既未家喻户晓，人民亦莫由而知。逾年庚戌，春雨及时，烟苗茁壮，未几，叶茂花繁，正喜收获在望，而铲烟之令遽颁。县衙因执行困难，为推卸责任计，先后呈报大吏。彼时，山西巡抚丁宝铨闻报，即派新车混成旅管带夏学津带兵前往，驻扎开栅镇，帮同两县知县铲烟，分兵分段，督令根除。人民生死关头，环跪哀求，愈趋愈众。该夏学津鲁莽灭裂，不善陈兵劝导，宽猛兼施，反恃其为了抚亲信（其妻姿容妖艳，人称夏姬，传言拜丁为其义父，日常出入抚署，颇有非议），群众略事喧噪，即操切从事，下令排枪射击。一刹那间，哭声震天，死伤群众三四十人，更威逼人民，持竿横扫，烟苗顷刻而尽。该夏学津自以功居其首，又有丁抚提拔，升官当在指日。讵料事为《晋阳日报》所闻，总编纂猗氏王用宾，以案情重大，即密嘱崞县张树帜，阳曲蒋虎臣两人，驰赴肇事区域，实地察访，归来按其所记，撰成紧要新闻，披露报端。丁抚见报，怒形于色，即传报社总理猗氏刘绵训，夤夜入署，作色谕曰：交文匪徒，聚众抗官，死伤多人，自有背景（暗指革命党人策动），何得谓为禁烟肇事？尔为该社总理，应先将此项新闻，妥为更正，此后不再乱登，并许以知府保升。当时刘虽有代表舆论身分，而又系法政学堂监督，处于丁压制下，未便当面顶驳。归来报社，

与王等商谈，咸以报纸为人民喉舌，人民遭此惨祸，事实俱在，岂能颠倒黑白，而歌功颂德，为吾等求荣者乎？当下决定：由刘登裁启事，辞去报社总理，在股东会未召开另选以前，其职权暂由总编纂王用宾兼代；关于千真万确之新闻，不惟不能予以更正，尤须视其演变如何，继续刊登，以尽职责；至刘对法政学堂监督一职，亦留呈固辞。次日黎明，即登车离晋。此时报社理事，系万泉李少白，亦因举贡考取，请假赴京，所遗职务即由新兼总理委托报社发行人、虞乡尚德兼代。是日报登启事数则，又以王之笔名“蕤”刊登：“予欲无言”四字，欲以略事缓和中，仍寓讥讽之意。丁抚见报，知刘已去，新闻亦未更正，大为震怒，首将张、蒋两访事，拿交阳曲县衙看管，并诬陷关于此案一向肯说话之谘议局议员临晋张士秀，以“挟妓逞凶”罪名，捕交法庭，判处徒刑二年，解回原籍临晋监狱执行。然而丁抚权威，钳制舆论，仅能及于山西，而汉口《中西日报》，上海《申报》，北京《国风日报》，以及各埠报纸，对于此案无不尽情登载。更有外埠报纸，揭发丁与夏妻关系，而酿成此案之《晋阳日报》，亦于“微言”栏内，摘刊“营营青蝇，止于棘”，而刺之。丁抚此时，已知无法掩盖，遂变本加厉，先将业已离晋之前《晋阳日报》社总理刘绵训，专折奏参，意在造成山西党锢，捕拿王、尚，转移社会视听。当时风声鹤唳，王知不能立足，报亦再难继续出版，遂由尚秘密送至石家庄，寓迎宾旅馆，立撰《正告山西谘议局》社论一文，内有“饥民之为匪徒，诸君之充议员，俱见宣统二年之山西，可谓之破天荒，可谓之循环纪念物也”等语，文长数千言，刺尽当时不恤民命之官绅，更为“微言”栏摘诗经原句“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以刺丁抚。稿既脱，王即买票东渡赴日，尚则怀稿潜回太原，当晚发刊付印。发行后，亦即密赴北京，报亦从此停刊。丁抚见报，怒不可遏，正拟大兴党狱，以泄其愤，岂知事先已被御史胡思敬，以

山西巡抚丁宝铎，办理禁烟，措置失当，枪杀多人一案，专折奏参，上谕“交直隶总督陈夔龙彻查，拟议具奏”。丁抚见抄，气焰万丈，虽多方弥缝，无如伪难乱真。旋奉上谕，丁抚调苏，夏学津撤职，永不叙用。直督杳办具奏，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若此巨案，竟尔如此了结，死难群众，未闻如何抚恤，正义人士，均尚禁锢囹圄。丁抚去后，尚则急由北京返里，因与猗氏县知县赖庆荣有旧，始将王用宾之老父，由看守所提出，寄羁马神庙，以示优待，又往返临晋监狱，安慰张士秀者，亦非一次。直至辛亥革命军兴，太原光复，被禁之士，方始释出，王亦先期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一桩重大惨案，至此始告结束。

时隔四十余年，我虽事内之人，记述亦难免遗漏，仍须就正于知者、贤者，而补充焉。

（本文作者为山西文史研究馆馆员）

辛亥革命时期新军以外 的各种力量

南桂馨

在同盟会以前，兴中会自始就和广东的会党有着紧密的联系；华兴会之对于两湖会党，光复会之对于浙江会党，也同样保持着应有的联系。等到同盟会成立以后，仍然贯彻了这种策略，而且对会党以外的民间各种实力，也尽可能地加以吸引。南方如此，北方如陕、豫各省，也不例外。

但山西的情形，那就大不相同。在辛亥起义以前，运动的对象是新军，酝酿的中心在太原，革命的领导人物，从未注意到各地方的实力。但在山西南、北、中路，却有一些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且在起义以后，也有过不同程度的革命表现。兹就我所经历和知道的各路实力，分述如下：

甲、北路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崞县、忻州一带，有一种光棍组织。“光棍”这个名词，很难给以相当的概念，仿佛它有勇敢不屈的精神，然不一定是正确的。例如他们见到不讲理的人，敢于挺身出来斗争；他们失败，不论受到对方怎样的惩治，绝不求饶。那时忻州、崞县组织戏班的很多，这些戏班，常年巡演于晋北及绥远等地，而且哪里演剧，那里就有赌场，赌场的赌徒往往有些输打羸弱的，没有保护者，赌场就继续不下去。因此，光棍们就到处受赌场的供养，作为他们的保护者；反之，如果赌场不供养他们，他们就变作赌徒，扰乱赌场。当然，光棍们活动的

范围，不完全局限于赌场，但赌场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因此，这些光棍们的势力，就随着戏班的巡演演出，从晋北达到了绥远等地。光棍们虽然分散各地，然不是无组织的，那时他们的组织领导人者，就是崞县人弓富魁。同盟会员崞县人续桐溪，认为光棍们的力量可以帮助革命，从而和弓富魁结成深厚的友谊，弓就加入了革命阵营。辛亥起义后，他们和五台的赵丕廉成立了忻代宁公团，以千余团员，几百枝老毛瑟枪，智入大同，^坚苦守了四十余日，一方面牵制了宣化的清兵，一方面扩大了革命的声势。我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里已经写过了，这里从略。但很可说明，这支实力，对革命的帮助是很大的，而阎锡山在当时并没有予以足够的支持，这也是尽人皆知的。

其次，灵丘县人杜上化，清末举人出身，在乡授徒。他看见清朝政治腐败，不久必归灭亡，倘能纠合一部分实力，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大，乘机揭竿而起，必能夺取部分政权。他鉴于汉代的五斗米道、清代的洪秀全等，都曾利用宗教，取得广大人民的信奉，因而他也仿效这一办法。他们村里有一牧人，经常有六朝僧人名“桂馥”（或贵佛）者。附到他的身上说些神话。杜上化就利用这个机会，给“桂馥”建了神庙，并且通过牧者之口，宣传种种杜所想办的事。因此，得到本村和邻村农民的信仰，从而由近及远，联络了五十三个村落，以联庄会为名，组成了以杜为首的实力团体，意在推倒清朝之后，夺取山西政权，进而称王称帝。后来山西谘议局成立，杜被选为议员，又以他弟子们的拥护，当选为该局的副议长。渐渐听到同盟会的革命学说，他很同情，从而他的这部分实力，在推倒清朝方面，也是可以利用的。

在辛亥革命时，杜仍在省，没有回乡发动。但在阎退绥西、卢永祥军入晋之际，革命党人如魏德新、王锡三等都曾受杜的保护，避在他的家乡。而忻代宁公团安然退出大同城，也是由于杜的奔走调和。在这些方面，杜所凭借的就是他的联庄会。

乙、中路方面：有四川人吴汇之者，久在太谷县行医。他是哥老会员，秘密联络会党有所活动。但起义后，省方对他并未注意。后来他投向李鸣凤，被委为绛州知州。在杨彭龄收拾残部，由雪花山、乏驴岭向晋南转进时，道经绛州，吴汇之曾经附和杨彭龄部。但他又和公孙长子联合建议李鸣凤，反对温寿泉为副都督，主张另选。事虽未成，终究造出了晋南独立活动的后果。

丙、南路方面：南路方面哥老会党较多，其中心地区有二。一为洪洞、赵城区，其首领名牛如虎，颇同情于革命，但与省方素无联系。南桂馨受阎命入陕求援，道经此区，和牛如虎见面，并以亲笔信介绍牛与阎晤，阎委了他一个名义。在攻打平阳镇谢有功之役中，牛率所部，身先士卒，虽以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但也收到了相当的战果。又一为猗氏、永济区，其首领名杨九娃，因为人数不多，在起义后，和省方没有联系，势太孤立，因而渡河入陕。南桂馨到陕后，杨九娃求南介绍他加入东路都督张伯英部，南即照办，但最后杨九娃编入陈树藩旅。迨张士秀清陈部过河，打击反动帮统陈政诗时，杨部随同到了运城，一面击败陈政诗部，肃清清朝的残余势力；一面把猗氏县长的全家杀尽，为哥老会的弟兄们报了深仇。这对山西革命，也有一定程度的贡献。

此外，还有平阳镇总兵官谢有功的巡防营是可以利用的，但因措置乖方，致成反动，这里也应当略加叙述。平阳镇属的巡防营，以谢有功兼统带，陈政诗为帮统。辛亥起义后，最反动的陈政诗已经统领一部巡防营南调，所留在平阳的一部分，该地绅士侯少白和他们有所联络，本来可以不经战事，和平光复平阳的。但阎派来的接收大员和军队，乘谢率部他往之际，突入平阳。侯少白建议保护谢有功的家属财产，请谢返回平阳。谢如愿留，仍然担任原职，听侯调遣；如愿去职，革命军礼送出境，巡防营归革命军改编。侯的建议，已经取得谢部同意，但阎方拒绝，坚持

无条件地接收。谢有功大怒，回戈反击，致阎的接收官员刘汉卿牺牲，刘拱壁坠城折股，而侯少白也几乎及难。这些处置，招来了谢有功负隅数月，杀害了革命同志常樾等，阻碍了革命军中、南两路的交通。关于这一经过，侯少白已有详细记述，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

（本文作者为山西省政协委员）

陆鍾琦父子被击毙和陆光熙的 政治面貌

王定甫

为了全面研究山西辛亥革命起义情形，我们访问了几位亲自参加或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人和当时清朝在山西最高统治者巡抚陆鍾琦的亲属，了解到了当时山西起义军击毙陆鍾琦父子的情况。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纠正和补充过去有关陆鍾琦父子被起义军打死的不完全的或错误的记载。如文直公所著《中华民国革命史》一书有民军“俯攻巡抚署破之，杀陆鍾琦全家……”，邹鲁所著《山西光复》一文有“攻获陆鍾琦，枪杀之，陆子若妻出视亦毙。”郭孝成所写的《山西光复记》文内有“新军入抚署，先获陆抚，枪毙之，陆抚之子亮臣偕其母出视，均枪击而死，陆之姐穴墙逃去。”印鸾章所著《清鉴》一书，则谓“鍾琦全家死节”。我们访问了陆鍾琦之孙女，即陆光熙（亮臣）之女儿陆士嘉，陆鍾琦之孙陆鼎元（鍾琦长子仁熙之子）和陆光熙之妻弟施今墨老先生。我们还就陆光熙是否是同盟会会员，访问了李书城老先生和金应豫老先生。陆鍾琦之孙辈当辛亥革命时尚在幼龄，他们所谈除亲自经历过的事情以外，都是前辈的传说，需要研究和考证的地方就要多些。兹就我们访问的记录整理简述如下：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山西起义军进攻巡抚衙署，山西巡抚陆鍾琦闻警，穿戴官衣，由其侍役李升、郑某二人护持下，仓促向通往督练公所的后门逃去，拟找姚鸿法商议应付对策。陆走近后门，忽又中途返身折回。其子陆光熙见陆鍾琦已出